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冰心作品选

一九九一年

冰心作品集



1991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91 年

- 漫谈“视听之娱” (2)
- 我得到了中国第一尊女寿星 (4)
- 我感到了无上的幸福 (7)
- 《周恩来风范词典》序 (9)
- 愿他睡得香甜安稳
- 悼念井上靖先生 (10)
- 致王蒙 (2 月 9 日) (12)
- 关于男人 (之十一)
- 十三 悼念孙立人将军 (14)
- 话说萝卜白菜 (18)
- 致黄秋耘 (2 月 25 日) (20)
- 致严文井 (2 月 25 日) (21)
- 《神州轶闻录》序 (23)
- 致袁静 (25)
- 致周达宝 (3 月 2 日) (26)

关于“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27)
回忆中的胡适先生	(29)
致陆星儿 (4月1日)	(32)
周恩来总理——我所敬仰的伟大的共产党员	(33)
致陈慧瑛 (5月10日)	(45)
致王一地 (5月16日)	(46)
我从来没觉得“老”	(47)
追念许地山先生	(50)
《华夏诸神》读后	(53)
话说“客来”	(55)
纵谈“断句”	(57)
咪咪和客人之间	(60)
世纪印象	(62)
悼念李汝祺教授	(64)
说说我自己	(67)
致陈莲涛 (8月1日)	(69)
致周达宝 (8月12日)	(70)
我神游于阿里山、日月潭	(71)
我祖父的自勉词	(72)
致铁凝 (9月5日)	(74)
致王一地 (9月11日)	(75)
玻璃窗内外的喜悦	(76)

再写萧乾	(79)
我的家在哪里?	(81)
为“陆游杯”全国诗歌赛题词	(83)
致林正让	(84)
“孝”字怎么写	(85)
关于男人（之十二）	
十四 我们全家人的好朋友——沙汀	(88)
在介绍中国出版的黎巴嫩的作品的会上的	
书面发言	(90)
我看小说的时候	(91)
介绍一篇好小说——刘平的《代笔》	(93)
“大雪”这天下了大雪	(96)

1991 年

漫谈“视听之娱”

我虽因伤腿，十年没有参加社会活动了，但正因为整天在家，便不断地有客人来访；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告诉我社会新闻，和我讨论时事的交谈，就十分新鲜有趣。此外我还收到许多信件，今年得到的贺寿贺年卡片数目，是空前的，把我客厅里的两张书柜的玻璃门里都立满了！

此外，我几乎天天有新的书刊可读，这些都是一些出版社送的，我从心里感激他们！

最重要而且是最方便的，是我每天上午 7 时至 9 时，下午 12 时至 2 时，都躺在床上休息。但我并不睡着，只在枕上听收音机，听些新闻和报纸报道。到了晚上我从来不看书也不写字，只开开电视机，听着时事联播，或者听听京剧或电视小说。

我觉得在我的身躯里有军人之血。听收音机我爱听军事消息，看电视喜欢看“人民子弟兵”节目。这两段节目里，都有中外各国的陆海空军事消息，有

人物也有武器，十分令人兴奋。

我也喜欢听收音机和电视机里的歌唱表演，如胡松华的“颂歌”和董文华的“十五的月亮”，听了都使我感到回肠荡气，不能自己！我想我若有像他们那么好的歌喉，那么当我在大海之滨或高山之巅的时候，就可以纵情歌唱了，可惜——

1991 年 1 月 5 日晨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91 年 1 月 23 日。）

我得到了中国第一尊女寿星

一九九一年一月四日上午，民主促进会三位中年干部，给我送来了一个长方形金红色的锦盒，打开看时，里面是一尊女寿星和一把上面画着梅花的小巧精致的茶壶，上面写着“冰心玉壶，黄笑音绘献”。这已经使我十分欢喜了。等到我把盒里的那尊女寿星摆在我书桌时，在阳光下她简直是光彩照人，不可逼视！

她右手拄着上面挂着一只金葫芦和两摞画轴的一根龙头藤杖，左手捧着一只寿桃，盈颠的白发上，束着一条绿色的镶着一块白玉的头箍，脑后髻上插着一根金簪和一条结花的红带。她脸上充满了雍容慈祥的笑，两耳垂肩，穿着暗红色的长袖上衣和带纽扣的、有金花边的绿背心。下面是束着红带的淡绿色带圆金花的裙子，裙子上还钉着两只金蝙蝠。下面是露在裙下的红色高底鞋。

和这只金黄盒子同来是一封“中国民主建国会

景德镇市委员会”的信：里面尽是些客气的话，我也不好意思重抄！只录下重要的事实：

我会会员，市雕塑瓷厂高级工艺美术师张正海同志拜读了先生在今年第二期《随笔》上发表的《市场上买不到一尊女寿星》一文后……利用工作之余，他翻阅了有关资料创制了一尊目前国内罕（“罕”当作“无”，冰心注）有的女寿星瓷雕（我会成员许堂婆同志为瓷雕彩绘装饰），尽管作品设计还不尽本意，但凝聚着他对老人无限崇敬的心情。在躬逢先生九秋华诞之际，以此祝愿老人童心常驻，健康长寿。

这尊女寿星现在就立在我的案头，面对着我，露出满脸的欢喜的笑！

我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第一个得到一尊女寿星的女性，我感到幸福！！

1991 年 1 月 8 日阳光满案之晨

我还有个请求，我们中国的雕塑工作者们，不但要雕塑瓷制的女寿星，还请木雕的、捏泥人、面人的美术工作者们都可以来雕或捏一些大大小小的女寿

星，供给全国人民庆贺女性寿辰之用。同时，我们在亚、非、欧、美都有许多女朋友，若是把一尊女寿星送出国去做生日贺礼，岂不是一件十分新奇、高贵的礼品吗！

又及

我感到了无上的幸福

一月四日上午民进中央三位干部：彭玲、郑芳龙、徐德骁给我送来一尊女寿星和一封信。信是从中国民主建国会景德镇市委员会来的。里面有许多的溢美客气的话。我不好意思多抄了，只将这尊女寿星的来历讲了一下：

我会会员，市雕塑瓷厂高级工艺美术师张正海同志拜读了先生在今年第二期《随笔》上发表的《市场上买不到一尊女寿星》一文后……利用工作之余，他翻阅了有关资料，用传统工艺手法，特地为您设计，创作了一尊目前罕有的女寿星瓷雕（我会成员许堂婆同志为瓷雕彩绘装饰）——但愿老人童心常驻，健康长寿。

这尊女寿星从锦盒里被捧了出来，立在我的书案上，在满案的阳光中，她是那样地光彩照人，不可逼视！兹寄上相片两张，希望《民主》的读者们可以

和我同饱眼福。

我是中国数千年来第一个得到了一尊女寿星的女性，我感到了无上的幸福！！

1991 年 1 月 10 晨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主》1991 年第 3 期。）

《周恩来风范词典》序

姚晶华副教授来要我为《周恩来风范词典》作序，她还略带些不安的神色说：“这都是些‘非常的平常’的人写的”。

我激动了！

“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这两个歌谣式的句子，多少年来，传遍了中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

亿万“非常的平常”的中国人民，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机会，亲近、瞻仰了周恩来总理的风神、风骨、风仪……他们忍不住把他们心坎上永志不忘的伟大而平易的印象，挥洒了出来，这便是这本《周恩来风范词典》的来历！

1991 年 1 月 27 日阳光满屋之晨

（《周恩来风范词典》，工人出版社 1991 年 4 月第 1 版。）

愿他睡得香甜安稳

——悼念井上靖先生

1月30日晨，我得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先生于昨天午后十时逝世了！

这是一声惊雷！我请人代我发了唁电。

我和井上先生有一段很深的文字姻缘。1982年，井上先生屡次到中国的西域，如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敦煌、凉州、甘州，寻觅那些埋没于茫茫黄沙之下的古迹。他在《西域小说选》里写道：“只有在倾注了青年时期的心血的小说的舞台上，我才能睡得如此香甜、安稳。”

中央民族学院的两位教师，把《井上靖西域小说选》译成中文，让我作序。我的序中提到，从六十年代初期起，我们频繁地来往，有的是在东京的他的府上，有的是在北京的我的家中。这重叠的画面上，有许多人物，许多情景……特别是井上先生每次从中

国的西北回到北京，就热情洋溢地告诉我他的旅游见闻的一切，亲切熟识，如数家珍！

我感谢井上靖先生，他使我更加体会到我们国土之辽阔，我国历史之悠久，我国文化之优美。

他是中国人最好的朋友。

他在中日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虹桥。我向他致敬！

现在我在北京家里为他默哀，祝愿他在自己的国土上，也和在中国西域的茫茫黄沙中一样睡得香甜安稳！

1991 年 2 月 6 日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91 年 3 月 9 日。）

致 王 蒙^①

王蒙：

您写的《雨在义山》收到并拜读过了。这几天来拜年的人特多，赶早起写几个字。说实话我不喜欢雨，我爱阳光、爱雪（记得毛泽东说他爱三李：李白、李贺、李义山）。您有这闲工夫看诗，可怜我这老人，连看诗的工夫都很难得。有工夫来坐坐，我有许多话想说。

吴青他们都问您好，瑞芳好，祝新春万吉！

^① 王蒙，作家，河北南皮人，1934 年生于北京。1953 年开始创作《青春万岁》；1956 年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60 年代到新疆，1979 年回北京，相继任《人民文学》主编，文化部部长。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评论。主要有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短篇小说《布礼》、《蝴蝶》、《相见时难》、《悠悠寸草心》、《春之声》、《高原的风》；长篇散文《访苏心潮》等。

冰 心

二·九·晨

一九九一

关于男人（之十一）

十三 悼念孙立人将军

孙立人将军是吴文藻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同班同学。我们是 1923 年 8 月 17 日同乘美国游船杰克逊号到美国去的，但那时我并不认识他。

我们的相熟，是在四十年代初期 1942—1944 年之间。那时我们在重庆，他在滇缅抗日前线屡立奇功，特别是在英国军队节节败退之后，孙立人“以不满一千的兵力，击败十倍于我的敌人，救出十倍于我的友军”，在世界上振起中国军人的勇敢气魄！

孙立人常常要来重庆述职。（所谓之述职，就是向蒋介石解说“同胞”们对他的诬告。他不是“天子门生”，不是“黄埔系”，总受人家的排挤！）在此期间，他就来找清华同学谈心，文藻曾把他带回歌乐山寓所，这时我才得见孙将军的风采。在谈到他在滇缅

路上的战绩时，真是谈笑风生，神采奕奕！他使我们感到骄傲！

1950 年国民党撤到台湾，他出任台湾防卫司令。1954 年 6 月，当他调任台湾总统府参军长时，因一名部属准备发动兵变而被罢黜、被看管。同年 10 月，孙立人将军被台湾政府免去职务，软禁了 33 年，直到 1988 年蒋经国去世后，才由台湾监察院公布调查案，孙立人将军才获得自由，这时他已是 88 岁的憔悴老人了！

1990 年 3 月，我曾通过台湾的许迪教授给孙立人去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回大陆一行，不几天就得到孙将军的复函：

婉莹嫂夫人大鉴

许迪先生来舍朗读手书其于立人尤殷殷垂注闻之至为感篆回忆同舟东渡转瞬遂近七十年昔日少年俱各衰迈而文藻兄且已下世人事无常真不可把玩也立人两三年来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虽行动尚不需人扶持而步履迟缓不复轻快有时脑内空空思维难以集中比来除定时赴医院作复健运动外甚少出门矣故人天末何时能一造访畅话平昔殆未可必然亦终期所愿之得偿也言不尽意诸维 珍卫顺候 著安 弟孙立人拜后

一九九〇，五，十五

去年，在我的九十生日（10月5日）又得到他的贺电：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欣逢九十大庆敬祝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弟孙立人拜贺

不料过了一个半月，有一位年轻朋友给我寄来一张香港《明报》的剪报，上面载“因兵变案软禁三十三年，抗日名将孙立人病逝”。记者写的“昨日”是11月21日！

屡次替孙将军和我之间传递信息和相片等等的台湾许迪教授，前些日子又给我来信说：“孙立人将军的丧礼确是倍极哀荣，自动前往吊唁者一万余人，今后在台湾大概不可能再有同样的感人场面了……”

从许迪先生带来的孙立人的相片上看来，三十三年软禁后的孙将军，显得老态龙钟，当时的飞扬风采已不复留存！本来应是三十三年峥嵘的岁月，却变成蹉跎的岁月，怎能不使人悲愤？

我少作的集龚绝句，其中有：

风云才略已消磨
其奈尊前百感何
吟到恩仇心事涌
侧身天地我蹉跎

竟是为孙立人将军写照了！哀哉！

1991 年 2 月 20 日黄昏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1993 年第 3 期。）

话说萝卜白菜

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她（他）自己的“喜爱”和“不爱”，所以北京有谚语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我喜欢“无忌”的“童言”！孩子们来到座前，叫声“奶奶”后，就对我书桌上的一切东西，都发生了兴趣。问“这个是干嘛用的？”“那个是干嘛用的？”看到我桌边垂下去的一根电线下的电铃，也问“这是管什么的？”我说，“我行动不便，这是叫人来帮助我做这做哪的。”他们笑着摇首说“我们用不着这个！”我们谈得很自由，很痛快。我觉得凡是“足将进而趋起，口将言而噤嚅”的结结巴巴的孩子，都是不幸来前受过大人的“训练”的！

孩子又说：“我们一进屋就闻到香气，您特爱水仙吧？”他们的嗅觉可真灵！

在此我倒想讲一讲我对于花朵的选择。我不像我的祖父和父亲那样，会种花养花；但是我却喜爱一切的花朵。而在我十二岁回到福州故乡时，堂姐姐们

叫我和她们一样，在衣襟上挂上用细铁丝穿着的两朵白玉兰或是半球形的茉莉花时，我就断然地拒绝了，我受不了那使我头痛的浓郁的香味！

我喜欢兰花（空谷佳人）、桂花和水仙花。古人咏水仙花的诗句有：“生意不须沾寸土，通词直欲托微波”，说明了她是如何地清高雅洁。

苏东坡恨海棠无香；我倒觉有“香”而不“清”，倒不如无香！如果海棠花有使我头痛的香气，则我决不会在那繁花密叶的树下坐到半天。

朋友来看我，往往会带些花来，这礼物比什么都好！我有一对学生的女婿（不知道他姓什么，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双辉），我案头这盆水仙就是他挖好送我的，叶子特别短而弯，花朵特别多而直，精神极了！还有其他朋友送的：君子兰，郁金香，马蹄莲……，都是有色无香的花。我停笔猛一抬头，都有一种暖烘烘的“惊艳”的感觉！

现在有人说：送老人最好送“晚香玉”也就是“夜来香”，那正是古诗人所谓的“媚夜之淫葩，殢人之妖草”，是我最不喜欢、最头痛的一种花！不知别的老人以为如何？

1991 年 2 月阳光满屋之晨

（本篇发表于《文汇报》1991 年 3 月 27 日。）

致 黄 秋 耘^①

秋耘先生：

陈钢回来，带来大作《风雨年华》，当天就拜读了。我们这一代人，哪个没有“风雨年华”？把它写了下来，正如古诗中所说：

安顿惜花心事处
谢他昨夜风和雨

写完总是了却一件事，以后好好过日子吧。
春寒望珍摄！

冰 心

一九九一、二、廿五

① 黄秋耘，作家，1918年生于香港。1935年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历任广州军管会文艺处创作出版组组长；新华通讯社福建分社代社长；《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广东省出版局副局长。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浮沉》，报告文学集《控诉》等。

致 严 文 井^①

文井：

这些（按指《绝句八首》）是我在贝满中学上学期间（1914—1918）的少作。《关于男人》（你一定有一本）中，我的小舅舅要把我培养成一个才女，教我琴、棋、书、画，我一样也学不成（我从小男装，是个坐不住的孩子），却从他买给我看的诗集中，迷上了龚定庵、黄仲则（《两当轩诗集》）和纳兰性德。

如龚诗中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黄诗中有“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都是极好的句子。

龚定庵有己亥杂诗三百首，当然可以集成不少绝句。我把记得的都写下了。有人问我要字，我只好

^① 严文井，儿童文学作家，1915年生，湖北武昌人。1938年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历任《东北日报》副总编，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人民文学》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主要作品有《山寺暮》、《“下次开船”港》、《小溪流的歌》等。

写这些（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葛翠琳和你，别人就不写了）。第一首就没写过，因我不喜欢“暮气颓唐”四字。第八首我也没写过，因为有点“老王卖瓜”之嫌。“我”若原是“汝”字，就可以写赠许多女作家了！

又有客人来。匆祝
双安。春寒望珍摄！

冰 心

二、廿五、一九九一

《神州轶闻录》序

让我为《神州轶闻录》这部很有分量的书作序，使我惶恐！虽然在九十年的岁月中，有七十年是住在北京的我，住过“天棚鱼缸石榴树”的四合院，从西直门骑驴到过卧佛寺，吃过赛梨的萝卜和糖葫芦……但是看起《京华感旧录》，那五卷里掌故、风土、艺文、名胜、人情等，大都是我所不知道的。首次到北京的外国朋友和国外华侨，往往来问我：“你是老北京，请你告诉我逛北京要如何逛法？”我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你首先要去的是天坛公园，那座祈年殿，是我觉得在欧、美、亚、非的任何建筑都不能与她相比的；再就是去登上景山之巔，俯看北京城全景，故宫的设计也全看到了。此外，去吃顿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此外就是我认为可去可不去的地方，你再听听别人的意见吧。”

我从八〇年伤腿之后，不良于行，新北京的建筑我都没有看见过，但这不是古迹，也不在我们谈话之

列了。

我所能写的，就是这些。

1991 年 2 月 26 日

致 袁 静^①

袁静大姐：

书^②和来函都拜领且已拜读。你写的科学童话连我这老人看了都感到有趣，孩子们一定更欢迎了。何时来京？请到舍下一叙。

春寒望珍摄

冰 心

（此信刊于《河南画报》1991 年第 6 期，田丕津的《冰心老人二三事》文中。）

① 袁静，女作家。祖籍江苏武进，1914 年生于北京。1940 年赴延安。1945 年调边区抗敌文艺协会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1950 年调中央电影局任编剧，1957 年任天津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新儿女英雄传》、《淮上人家》、《小黑马的故事》、《逃》、《芳芳和汤姆》、《众英雄和小捣蛋》等。

② 《众英雄和小捣蛋》。

致 周 达 宝

达宝小友：

你来信为何不写你家的地址？你不是退休了吗？忽得来书，如晤故人。我很好，就是忙些。我的事你也帮不上忙，谢谢你！（我的事都是回人家的信。）

春寒望珍摄！

冰 心

三、二、一九九一

关于“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在我们的想象里，“百花齐放”是一幅多么鲜丽的画图；“百家争鸣”是一个何等痛快的场面！但是要“百花齐放”，必须有风和日丽的“天时”，也要有阔大肥美的“地利”。“百家争鸣”也要有据理力争（这“理”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理）、畅所欲言的自由激发的论坛。

提倡双百方针的领导者，必须布置安排下一个能促成“齐”与“争”的空气和环境。

我的手边正放着一本《龚自珍全集》，随便翻开，正看到他的一首《咏史》：

金粉东南十五州，
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
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
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
难道归来尽列侯？（重点是引用者加的）

足见中国历史上已有了不少的“文字狱”！但诗人还有一首沉痛的呼吁：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材。

今天，我们不信天公，却相信人力。只要有“抖擞”起来的人力，那么，“不拘一格”的“人材”，自然会一群一群地“降”下来的！

1991 年 3 月 5 日晨急就

（本篇发表于《群言》1991 年第 5 期。）

回忆中的胡适先生

作为“五四”时代的大学生，胡适先生是我们敬仰的“一代大师”。他提倡白话文，写白话诗以及许多文哲方面的研究的文章，还引进了西方的学术思想，他创始了当时一代的白话文风。我们都在报刊上寻读胡适先生的作品，来研究欣赏。同时自己也开始用白话来写作。

我和胡适先生没有个人的接触，也没有通过信函。只记得二十年代初期，我是燕大女校学生自治会的宣传股长，我的任务中有：当校方邀请教育界名人来演讲时，我就当大会的主持人，我在台上介绍过胡适先生，鲁迅先生，金陵女大吴贻芳校长各位名人，请柬是校方送的，我在讲台介绍过后，就在演讲者身后台上坐下，演讲完了，我又带头鼓掌致谢，和名人们并没有个人谈话。

胡适先生是美国留学生，燕大的美籍教师们和他特别熟识，称他为胡适博士，而不是“先生”。在

一九八九年香港出版的英文《译丛》32期上有“冰心专号”一栏，里面有燕大美籍教师鲍贵思女士在她的《春水》译本里曾引用了一段胡适先生对我的作品的评价。我请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杨立民教授代译如下：

“（当时）大多数的白话文作家都在探索一种适合于这种新的语言形式的风格，但他们当中很多人的文字十分粗糙，有些甚至十分鄙俗。但冰心女士曾经受过中国历史上伟大诗人的作品的熏陶，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底，因此她给这一新形式带来了一种柔美和优雅，既清新，又直截。”“不仅如此，她还继承了中国传统对自然的热爱，并在她写作技巧上善于利用形象，因此使她的风格既朴实无华又优美高雅。”

一九二八年冬，文藻和我在上海我的父母家里举行了简单的订婚仪式，那仪式是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一手操办的。我记得在红帖上，女方的介绍人是张君勖先生（他的夫人王世瑛是我的好友），男方的介绍人却是胡适先生。我不知道文藻和胡先生是否相识，但刘放园表兄做过北京《晨报》的编辑，同这些名人都是熟悉的。我不记得那天张、胡两位是否在座；这张红帖也已经找不到了！

我最清楚的是在一九三一年，燕京大学庆祝建

校十年的时候，我给校长住宅取名为“临湖轩”，那块青色的匾，是胡适先生写的，下面还有署名，大概也是我通过燕大的美籍教师请他写的。如今那块匾也不在了，虽然当燕大校友们在那里庆祝校庆时，仍称它为“临湖轩”。

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张小鼎先生送来一本台湾出版的《国文天地》六卷第七期“海峡两岸论胡适”专号，让我写一篇纪念胡适先生百岁诞辰的文章。从这本杂志里我才详细地知道了胡适先生的生平，并知道胡适先生是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并葬在台北南港旧庄墓园。这已是二十九年前的事了！我为他没有在故乡地下安眠，而感到惋惜。

1991 年 3 月 26 晨

（本篇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91 年第 4 期。）

致 陆 星 儿^①

星儿先生：

您为什么称我“老师”呢？这使我惶恐。

等我看完您的书，才给您写信，客人多耽误些日子，您认得的“女人”比我多得多了，写得真好！北京正开人大，来往的人太多，信也写不长，愿您再写下去！祝好！

冰 心

四·一·一九九一

（发表于《海上文坛》1992年1月号。）

^① 陆星儿，女作家，1949年生，上海人。1982年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毕业后，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任编剧；1988年到上海作协任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枫叶殷红》、《遗留在荒原的碑》、《留给世纪的吻》等。

周恩来总理——我所敬仰的 伟大的共产党员

我认识的共产党员不多，其中，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总理。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之际，我心潮澎湃的浪花上又浮现出周总理的高大身影。

第一次见到周总理

1941 年的春天，我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欢迎会上，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周总理。这次集会欢迎从外地来到重庆的文艺工作者的。会开始不久，总理从郊外匆匆地赶来。他一进到会场，就像一道阳光射进阴暗的屋子里那样，里面的气氛顿然不同了，人们欢喜活跃起来了！总理和我们几个人热情地握过手，讲了一些欢迎的话。这些话我已记不清了，因为这位磁石般的人物，一下子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只见他不论走到会场的哪一个角落，立刻就引起周围射来一双双钦佩的眼光，仰起一张

张喜悦的笑脸。他是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这在当时雾都重庆的悲观、颓废、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难见几次的灿烂的阳光！

周总理召见我们

1945年8月14日夜，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那时在“中央大学”和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我们的甥女和表侄女们，都高兴得热泪纵横。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直到1945年底我们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们作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时，1946年初，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他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运动等等，在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没有友好往来之前，趁这机会去日，倒是一个方便，但他只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和吴冰送回北平就学，住

在我的大弟妇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当年的 11 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着小女儿到了东京。

我们在东京的几年时间，是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文藻利用一切机会，同美国来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触。我自己也接触了当年在美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和一些妇女界人士，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时日本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中统等。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打桥牌为名，共同研讨毛泽东著作，便遣人趁文藻上班时，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架上取走一本《论持久战》。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1950 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

但离职后仍不能回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报日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到了香港，在周恩来、罗青长的帮助下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当年我送回北平学习的儿女，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期延长了，便也先后到了日本。儿子吴平进了东京的美国学校，高中毕业后，我们的美国朋友都劝我们把他送到美国去进大学，他自己和我们都不赞成到美国去。便以到香港大学进修为名，买了一张到香港而经塘沽的船票。他把我们给国内的一封信缝在裤腰里，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到北京。由联系方面把他送进了北大。因为他选的是建筑系，以后又转入清华大学——文藻的母校。他回到北京和我们通信时，仍由香港方面转。因此我们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人来接，我们从海道先到了广州。

回国后的兴奋自不必说！1951年至1953年之间，文藻都在学习，为接受新工作做准备。中间周总

理曾召见我们一次，是在我们从日本回来后的 1952 年的一个初夏夜晚。这一天午后，听说总理要在今晚接见我们，我们是怎样地惊喜兴奋呵！这一下午，只觉得夏天的太阳就是这样迟迟地不肯落了下去！好不容易时间到了，一辆汽车把我们带进了夜景如画的中南海，直到总理办公室门口停住。总理从门内迎了出来，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笑容满面地说，“你们回来了！你们好呵？”这时，我们就像海上沉舟，遇救归来的孩子，听到亲人爱抚的话语那样，悲喜交集得说不出话来。总理极其亲切地招呼我们在他旁边坐下，极其详尽地问到我们在外面的情况，我们也就渐渐地平静下来，欢喜而尽情地向总理倾吐述说了我们的一切经历。时间到了午夜，总理留我们和他共进晚餐。当看到饭桌上只有四菜一汤，而唯一的荤菜还是一盘炒鸡蛋时，我感到惊奇而又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的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在我们谈话吃饭之间，都有工作人员送进文件，或是在总理耳边低声说话，我们虽然十分留恋这宝贵的时刻，但是我们也知道总理日理万机，不好久坐，吃过了饭不久，我们就依依不舍地告辞了。总理一直热情地送到车边，他仰望夏空的满天星斗，感慨地对我说：“时光过得多快呵，从‘五四’到现在已经 30 多年了！”我听了十分惭愧！从

“五四”以来的几十年中，我走了一条多么曲折的道路呵！

倾吐了一腔冤愤

1958年4月，文藻被错划为右派。这件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他们当然不能说什么，也只十分诚恳地让我帮他好好地改造，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1959 年 12 月，交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 年又把错划予以改正。

最后的长谈 最后的报告

总理和我最后的一次较长的谈话，是在 1972 年的秋天。那天，我参加招待外宾的宴会，到得早了一些，就在厅外等着，总理出来看见我，就叫我进去“喝杯茶谈谈”。这间大厅墙上挂的是一张大幅的延安风景画，总理问我：“去过延安没有？”我说：“还没有呢，我真想在我还能走动的时候，去拜谒一次。”总理笑问：“你多大年纪了？”我说：“我都 72 岁了！”总理笑说：“我比你还大两岁呢。”接着他就语重心长地说：“冰心同志，你我年纪都不小了，对党对人民就只能是‘鞠躬尽瘁’这四个字呵！”我那时还不知道总理已经重病在身了，我还没有体会到这“鞠躬尽瘁”四个字的沉痛的意义！总理的革命意志是多么坚强呵！现在又使我想起，就是 1974 年的国庆宴会，总理含笑地出现在欢声雷动的宴会厅里，他是那样地精神焕发，他的简洁的讲话，是那样地雄浑而有力！

最后，就是 1975 年 1 月，总理在四届人大做政治报告的那一天晚上，他站在主席台入场的门口，和进场的代表们一一握手。我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微笑地问我：“冰心同志，身体好吗？”当我告诉他，我身体很好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又叮咛了一句：“要好好地保重呵。”我哪里想到，这一句话就是总理对我的最后的嘱咐呢？！

这一夜的人民大会堂里，灯光如昼，万众无声，总理的声音，是那樣的洪亮，那樣的充滿了乐观精神！他朗声读完政府工作报告后，台上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把雄伟的人民大会堂都震动了！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最后一次的政治报告呵，总理是用尽他毕生的精力坚持到底的呵！

我也参加过几次总理和少数几个人的谈话，那就像家人骨肉的闲叙家常，总理的谈话总是诚挚而亲切的。谈到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总理就恳切地谈着自己的家庭出身，谈着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强调思想改造必须出于自觉自愿，有了革命的觉悟，才能在思想改造上下苦工夫，才能不断进步。总理也强调通过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就能做出应有的贡献。总理的许多次谈话，都使我受到很大教益，深深印刻在我的心里。

我们等到了

1976 年 1 月 8 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噩耗传来，世界震动，举国哀伤。当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压制广大人民的悼念活动。可是没过多久，震撼世界的“四五”运动，就在掀起过五四运动的天安门广场上掀起了！这是一场声势更大威力更猛、光明同黑暗的、决定中国前途的殊死搏斗。那时，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活跃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和老伴无力远行，只好等待着听他们的报告。这段真情实感曾记在《等待》一文中。在此不妨抄下几段：

昨天晚上，我们最好的朋友老赵来了，说：他的一个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的亲戚，得到上头的密令，叫他们准备几十根大木棍，随时听命出动……他问我的女儿：“你们还是天天去吧？”我的女儿们点了点头。他紧紧地握了握她们的手说，“你们小心点！”就匆匆地走了。

我们都坐了下来，没有说话。我的小女儿走过来坐在我的旁边，扶着我的肩膀说，“娘，您放心，他们不敢怎么样，就是敢怎么样，我们那

么多的人，还怕吗？”她又笑着摇着我的手臂说：“我知道，您也不怕，您还爱听我们的报告呢。”

我心里翻腾得厉害。没有等到我说什么，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已经纷纷地拿起挎包和书包，说，“爷爷，姥姥，再见了，明天晚上我们还给您带些‘好菜’来！”

老伴走过来问：“她们又走了？”我点点头。他坐了下去，说：“我们就等着吧。”

我最怕等待的时光！这时光多么难熬呵！

我说：“咱们也出去走走。”老伴看着我，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

我们信步走出了院门，穿过村子的小路，一直向南，到了高粱河边站住了。老伴说：“过河吧，到紫竹院公园坐坐去！”我挽起他的左臂，在狭仄的小桥上慢慢地走着。

我忽然地抬头看他，他也正看着我，我们都微笑了，似乎都感觉到多少年来我们没有这样地挽臂徐行了！⁴⁷ 年前，在黄昏的未名湖畔我们曾这样地散步过，但那时我们想的只是我们自己最近的将来，而今天，我们想的却是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遥远的将来了！

老伴站了起来说：“天晚了，我们从前门出去吧，也许可以看见她们回来。”我又挽起他的

左臂，慢慢地走到公园门口。

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正如飞地从广阔的马路上走过，眼花缭乱之中，一个清脆的童音回头向着我们叫：“爷爷，姥姥，回家去吧，我们又给您带了‘好菜’来了！”

“万家墨面”之时，“动地歌吟”之后，必然是一声震天撼地的惊雷。这“好菜”我们等到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的朋友周明和刘茵把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悼念文章，编成一本《天上人间》。编后请我作序。我只看了目录，就呜咽得看不下去。我为这本集子写了不到百字的序言。在这里，我把它作为本篇的结尾，以表达我对周总理的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

我深深地知道这本集子里的每一篇文章，不论用的是什么文学形式，都是用血和泪写出他们最虔诚最真挚的呼号和呜咽。

因为这些文章所歌颂哀悼的人物是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总理是我国 20 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1991 年于北京

（本篇刊于《多党合作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出版。）

致 陈 慧 瑛

慧瑛女士：

您的大作《芳草天涯》早已收到并已拜读，只因不知您的地址，以致延误。昨天有福州同乡来，我才知道您在厦门。言归正传，您的散文我很喜欢，特别是抒情中都有叙事，不是空泛地伤春悲秋，风花雪月，这种文字我看腻了！希望您照此再写下去，您不是“小冰心”，您有自己的风格。春寒望珍重。

冰 心

1991、5、10

致 王 一 地

一地：

昨晚失眠，今早头晕，你要的字^①，勉强写好了，
反正再好也好不到那儿去！你看可用就用吧。

祝

好！

冰 心

一九九一、五、十六

^① 为“东方名人书画展”写的字幅。

我从来没觉得“老”

宫玺先生：

您来信要我写《论老年》，我想来想去，无从下笔。说实话，我的朋友中，老人不多，最老的也比我小几十天，他们在写作上也都没有停笔，如夏衍、巴金、萧乾等。其他的都是我的小朋友，从五六岁到四五十岁的都有。他们和我谈话或写信，虽然也有愤世嫉俗、忧民忧国的话，但还都是朝气蓬勃、天真乐观，我们从来没有提到一个“老”字！至于我自己呢，和儿孙们在一起谈笑，也没有关于“老”字的话。我不聋、不聩，脑子也还清楚，除了十年前因伤腿，行动不便，不参加社会活动之外，我还是照旧看书写信，而且每天客人不断：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他们都说我精神不错，脑神经也不糊涂（我倒是希望我能糊涂一些，那么对于眼前的许多世事也就不会过于敏感或激动）。我常常得到朋友们逝世的讣告或消息，我除了请人代送花圈外，心里并不悲伤。我觉得

“死”是一种解脱，带病延年，反而痛苦。我自己的医疗关系，是在“北京医院”，我照例每月去检查一次，大夫们都说我没有什么大毛病，也照例给我开一点药带回。

我居然能够活到九十一岁，是我年轻时所绝对想不到的！我母亲说，我会吐奶时就吐过血，此后的五六十年中，多多少少的，总是不断。在一九二三年赴美留学之前，曾到北京协和医院彻底检查，结果说：这是肺气枝扩大，不是肺癆，每次发病时，只要静卧几天，就可以了，也无药可治，可是到了一九五八年四月，在我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到欧洲访问，在到英国伦敦的火车上，忽然又大吐起血来，我怕惊动其他的团员，就悄悄地把一口一口的鲜血，吐在一个装水果的牛皮纸袋里，扔到了窗外。第二天又是英国作家们特地为我开的欢迎酒会，我不但不能静卧，而且还必须举着酒杯，站了一个下午！但是，奇怪得很，从那天以后，我居然不再吐血了，直到现在。

总的说来，我自己从来没觉得“老”，一天又一天地忙忙碌碌地过去，但我毕竟是九十多岁的人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忽然死去。至圣先师孔子说过：“自古皆有死”，我现在是毫无牵挂地学陶渊明那样“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祝好！

冰 心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化老人话人生》。)

追念许地山先生

俟松大姐来信让我为许地山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写纪念文章，我猛然惊觉，许先生逝世居然已五十年了！光阴激箭般飞过去了，而往事并不如烟！

我和许先生相识是在二十年代初期，他既是我的良师（他在当周作人先生的助手时，曾教过我国文）又是我的益友（他在燕大神学院肄业时，我在燕大文学院读书），关于他的学术方面，我是不配讨论的，对于宗教更是一窍不通，不敢妄出一辞，但是那时我已经读到他的小说散文，如：《缀网劳蛛》、《空山灵雨》、《无法投递之邮件》等，我十分惊叹他的空灵笔力！他教课时，十分洒脱和蔼，妙语如珠，学生们都爱上他的课。当我们同任燕大校刊编辑时，我更惊叹他学问之渊博。记得有一次他的文章里的一个“雇”字，我给加上一个“立人”旁，成了一个“僱”字，他竟然给我写了一封厚厚的信，引今据古说“雇”字的正确来源，正是“不打不成相识”，我

们从此就熟悉起来。

1923 年 8 月 17 日，他和我以及其他两位同学，一同搭乘杰克逊邮船赴美留学。就在这条船上，我请许先生去找一位我的中学同学的弟弟吴卓，他却阴错阳差地把吴文藻找来了，结果在六年之后，文藻和我成了终身伴侣，我们永远感谢他。

我是 1926 年回国的，许先生先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得学位后，又转到英国的牛津大学，于 1927 年回国。我们又同时在母校燕京大学任教。在北京，他结识了北师大理学士周俟松女士，他们订婚的消息，是 1929 年 1 月在燕大朗润园美籍教授包贵思家里，由我来向满客厅的同学和同事们之前宣布的！在客人们纷纷向许、周二位握手祝贺声中，我得到了“报答”的无上的喜悦，他们是 1929 年 5 月 1 日结婚的，在一个半月之后，文藻和我也结了婚，我们两家往来不绝。我是在 1931 年 2 月 6 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生了我的儿子吴平，俟松大姐也在两个月后也在协和医院生了儿子苓仲，并住在我住过的那号病室！

许先生在 1935 年由胡适推荐到香港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全家迁港，从此我们只有书信来往了。谁想到我的“学者”同学许先生，竟在不到“知命”之年，突然与世长辞！噩耗传来，友人们都震惊痛哭，到此我也不知道还再写什么了！“天实为之，谓之何

哉”！

1991 年 6 月 2 日浓阴之晨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新华日报》1991 年，8 月 21 日。）

《华夏诸神》读后

作家马书田送我一本《华夏诸神》，读后觉得十分新奇有趣。我们谢家，从来除了祖宗牌位之外，不供任何神佛。许多关于神佛的事，都是我从书上看到的，如《西游记》之类。

我对于《华夏诸神》中的神，最有印象的是“土地”，大约是八九岁的我，在山东烟台东山的村子、金钩寨的街上，看见过一座极小的庙宇，里面供着两位老人，是“土地爷”和“土地奶奶”。使我久志不忘的是庙门上的对联“此谓民之父母；以能保我子孙。”我曾就这副对联为题目，写过一篇短文。

此外就是“妈祖娘娘”了，也在我七八岁的时候，跟着我的父亲，到过烟台市的福建会馆，会馆前面有一座很大的天后宫。这宫殿建造得十分壮丽辉煌，宫门上有一幅很大的横匾，上面写着“海不扬波”。听父亲说：这天后宫的一切雕梁画栋，都是由福建做好送来的。天后是中国唯一的海的女神，她是福建莆田

人，姓林名默，关于她的神话很多，实际上，她的生地莆田湄州屿是个海岛，她一家都是渔民，她从小练就一身好水性，常常乘船渡海，也多次在暴风雨中救护过遇难的渔民和商人，被人们尊称为神女、龙女。在一千年前的一个大风暴中，她奋不顾身地去抢救遇难的渔民，不幸被强大的台风卷去……她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只活到二十七岁，未婚。

她死后被奉为女神，中国的每个港口，都有她的庙宇，此后的历史上关于她海上的神迹实在太多了！

民国时期，海军中福建人居多，每次我随父亲到军舰上访友时，军舰上的水兵，往往把我带到他们的房舱里去参拜天后，在天后的牌位小桌上，都摆着许多供品，还有酒瓶酒盅。他们说：天后可灵着呢！在海上遇到大风大浪时，连厨舱里的杯盆都倒翻了，只有天后供桌的酒杯，却安然不动。我问父亲是不是这样？父亲笑说，他没有到水兵舱里去证实过，酒杯不动，也许是因为它们太小的缘故。

总而言之，我很为我们中国有一位“海的女神”而且她还是福建人而感到自豪！虽然它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

话说“客来”

古人有诗云：“有好友来如对月”。

又有古诗云：“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一有梅花便不同。”

古人把客人当作光明透彻的月亮，又把客人当作暗香疏影的梅花。

我呢，每天几乎都有客来，我总觉得每一位客人都是一篇文章。

这文章，有抒情的也有叙事的。抒情的往往是老朋友或好朋友，在两人独对的时候，有时追忆往事，有时瞻望未来，总之，是“抵掌谈天下事”，有时欢喜，有时忧郁。

至于叙事的，那就广泛了！多半是“无事不来”的，总是叫我写点什么，反正我的文债多了，总是还不清，而且我的思想太杂乱，写下来就印在纸上，涂抹不去了，无聊的思想，留下印迹，总不太好，好在“债多不愁”，看心潮吧。

最麻烦的是来“采访”的。有的“记者”，对于我这人的来龙去脉，一概不知，只是奉总编辑之命，来写一个陌生人，他（她）总是自我介绍以后，坐下来就掏出笔记本，让我“自报家门”！话得从九十年前说起，累得我要死！

这篇文章是在灯下写的，时间是清晨，窗外却下着大雷雨，天容如淡墨。抒情的朋友是来不了了，叙事的，恐怕也要躲过这一阵，我就随便写下这一段小文。

1991 年 6 月 10 日 大雨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今晚报》1991 年 6 月 23 日。）

纵谈“断句”

每夜在将睡着、未睡着，每天在将清醒、未清醒的时候，总有一两句古诗忽然涌上心头，也不知道是哪个时代、哪位诗人写的，如

断带依然留乞句

这想是某个歌女在歌筵上撕下一段腰带请某诗人替她题一两句诗，现在她记起那时情景不胜眷恋。可惜的是底下一句，就总想不起来，若说是“依依梦里无寻处”，旧诗决不会在两句内，有三个“依”字。

这时又有李义山的两句诗，奔上我的思路：

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

写情写景都十分生动，又充满了“时代感”，唐时是只有团扇的（据说折扇是在明朝从高丽传到中

国来的)，古代车轮是木制的，上面还钉着钉子，不像现在的橡皮车轮，柏油路，自然走在路上是雷声隆隆了。

因此又想起清朝诗人黄仲则的：

水调歌从邻院度，雷声车是梦中过。

和他的：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和他的：

中表檀奴识面初，第三桥畔记新居。

那时社交还没有公开，只有中表兄弟姐妹，才有见面交谈的机会，所以恋爱故事多是发生在“中表”之间，所谓“兄妹为之”，《红楼梦》里的宝黛故事不是表现得最尽致的吗？

记得近代福建诗人有一本《红楼梦戏咏》，是从《红楼梦》故事里挑出十二个女人来“咏”的，其中咏黛玉的有两句：

凄绝篝灯焚稿夜，画屏银烛正吹箫。

对照得很传神。

以上都是“断句”，但也有我能背出全首的，如清代十砚老人黄莘田的：

半篙野水半篷烟，何处相思不可怜，
带酒眉尖江上看，一钩凉月四更天。

词意清妙，过目不忘。

忽然想起半个世纪以前冯友兰先生送文藻和我结婚的对联：

文藻传春水 冰心归玉壶

这时天色已经大明了。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一日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随笔》1991 年第 5 期。）

咪咪和客人之间

我的宠猫咪咪是十分好客的。每逢有客人来，它就跳上书桌，坐在我和客人之间，这位客人若也是养猫的主儿，咪咪也闻得出来，就和她（他）特别亲热。养猫的主儿，知道怎样使猫舒服，她（他）除了抚摸它的背外，还会挠它的脖子，咪咪就陶醉地一直钻到她（他）怀里去！

我的爱猫的朋友夏衍，还从猫书里给咪咪找出一个比“鞭打绣球”更堂皇的称号，是“挂印拖枪”，说它身上的黑点是“印”，黑尾巴是“枪”。最近又有一位客人，忘了是谁，他说：“咪咪的形象毛色，应该说是‘雪中送炭’。”这样，对于我，简直有恩施的意味。总之，咪咪是越来越神气了。

每逢客来，总有留影，于是每一张相片上都有咪咪，我的相簿里，几乎全是咪咪。不但此也，我的朋友们知道我爱白猫，于是送我的挂历、台历和贺年、贺生日的卡片上，都是白猫，有的卡片上的猫还有白

毛！我的屋里几乎是白猫的世界。

最近，舒乙编了一本《冰心近作集》，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封面上除了玫瑰花，还有咪咪的画像。我的女儿吴青说：“这本书的稿酬，应该归咪咪！”

咪咪是吴青从我的朋友宋蜀华、黄浦家抱来的。她说“咪咪是一九八四年二月四日生的。”

1991 年 7 月 3 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91 年 7 月 31 日。）

世 纪 印 象

世纪印象让我写文章，回忆中感想烽起！我一生九十年来有多少风和日丽，又有多少狂飙暴雨，终于过到了很倦乏、很平静的老年，但我的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永远是坚如金石的。

我的老弟萧乾说：“五四以来的中国作家经历过多少沧桑：由龙旗—五色旗—青天白日旗到五星红旗；由皇帝—军阀—太君—委员长到主席，走的是多么曲折、漫长而崎岖的路，时而浓云密布，时而万里晴空，时而又冰雹交加，他们不声不响地在把着舵，他们是历史最终的胜利者。”

我却认为“中国作家”应改为“中国人民”。毛主席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是传之万古而不磨的真理！五千年来中国的改朝换代，又何尝不像

国旗的升降？一面国旗颓然无力地降下去了，又一面国旗欢然灿烂地升起来了，一切盛衰兴亡都以“民心”为主宰，古人所谓之“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也就是“民心”，所谓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说的就是毛主席讲过的事实！

1991 年 6 月 19 日清晨

（本篇发表于《文艺争鸣》1992 年 5 月第 3 期。）

悼念李汝祺教授

在我认识李汝祺教授之前，就在他的未婚夫人江先群的梳妆台上看到他的照片了！

我是 1926 年从美国留学回到母校北京燕京大学任教的。江先群也是同年来到燕大生物系任教，我们同是最年轻的教师，一下子就投到一起。我在《话说相思》那篇文章里，曾提到这一段：

“有一天一位女同事（我记得是生物系的助教江先群，她的未婚夫李汝祺先生，也是清华的学生，比文藻高两班，那时他也在美国）悄悄地笑问我：‘听说你在班里尽教学生一些香艳的词曲，是不是你自己也在想念海外的那个人了。’”

大概是 1927 年，李汝祺教授也应聘到燕大任教，他们是在燕大校长住宅临湖轩结的婚，我还做了伴娘。他们的新居在燕南园，是我常去的地方，我在以“男士”署名的《关于女人》那本书里有一篇《我的朋友的太太》中就描写了他们的新居：

“我们被请去吃晚饭的那一晚，不过是他们搬入的一星期之后，那小小的四间房子，已经布置得十分美观妥帖了。卧室是浅红色的，浅红色的窗帘、台布、床单、地毯，配起简单的白色家具，显得柔静温暖。书房是两张大书桌子相对，中间一盏明亮的桌灯，墙边一排的书架，放着许多书，以及更多的瓶子，里面是青蛙、苍蝇，还有各色各种不知名的昆虫。这屋子里，家具是浅灰色的，窗帘等等是绿色的。外面是客厅和饭厅打通的一大间，一切都是蓝色的，色调虽然有深浅，而调和起来觉得十分悦目。”

以上都是实在的描写。1929 年，我的老伴吴文藻也来到燕大任教，我们是那年的 6 月 15 日在燕大的临湖轩结的婚，婚礼一切，都是江先群操办的。我们的新居也在燕南园，从此十余年中我们两家往来无间，真是情如手足，我们的儿女们，也是彼此互称为干爹、干妈。

“七·七事变”后，我们一家离开了燕大，到大后方的云南大学去，但和他们仍常通消息，直到解放后 1951 年，我们从日本回来，文藻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他们在北京大学，居处是远些了，但我们仍时有来往。1980 年我摔断了右腿之后闭门不出，不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了，但在 81 年江先群病危之际，我还是扶病去看她一次，这就是我们的永别了！

1985 年 9 月文藻也逝世了，我们两家只有儿女们有时互访。今年的 4 月 4 日李汝祺教授又弃我们而去。（关于他学术方面的成就，我是门外人，不能详细地论赞。）照理说 95 岁也算高龄了，但在他的老友心中，不能没有悲伤的！

1991 年 7 月 25 日清晨

说说我自己

李小林在两月之前，就写信叫我写自传。我的详细自述，早就陆续地在《收获》上发表过了，如今还叫我写什么呢？

我的“老弟”萧乾曾写过一篇短文，提到：“‘五四’以来的中国作家经历过多少沧桑：由龙旗、五色旗、青天白日旗到五星红旗，由皇帝、军阀、太君、委员长到主席，走的是多么曲折、漫长而崎岖的路，时而浓云密布，时而万里晴空，时而又冰雹交加。芸芸众生像是在任天公摆布，其实，他们不声不响地在把着舵。他们是历史最终的胜利者。”

我也算是“五四”以来的作家吧，但我是否作个历史最终的胜利者，就很难说了！

我只能把我自己的舵。我努力把我自己对于周围一切的感想和反应，无论是爱、憎、喜、怒，都痛快地发泄了出来，不管编辑者有什么难处，也不管能否和读者见面，横竖我已经写了，和我知己的朋友都

知道我的心情。

（本篇最初发表于《收获》1991 年第 5 期。）

致 陈 莲 涛

莲涛先生：

蒙赐猫蝶图一幅，栩栩如生，十分感谢。当即裱出悬挂。崙此鸣谢！并颂安健！

冰 心拜上

一九九一，八，一

（此信最初发表在《解放日报》1992 年 7 月 21 日。）

致 周 达 宝

达宝同志：

来示收入，《文摘报》错字极多，不说也罢。《五月风》字已写好，还是请你代寄吧，谢谢！我很好，你如何？

勿上请
合第安吉

冰 心

八，十二，一九九一

我神游于阿里山、日月潭

我的朋友周明把我《著译集》交给台湾华视文化服务公司出版了。

台湾本是我的故乡福建省的一个县，台湾同胞一直就邀我前去观光，终以年老体弱，未能成行。

其实在台湾，我有故交，有新友，有学生，有亲戚。我常常神游于阿里山、日月潭之间！现在我的作品，能和台湾同胞见面，就同我自己去了一样，我感到荣幸。

冰 心

1991 年 9 月 3 日

（本文刊于《文学报》1991 年 9 月 19 日。）

我祖父的自勉词

1912 年我从山东烟台回到我的父母之乡福建福州，在我的祖父谢子修老先生身旁呆了两年多，受尽了他的疼爱 and 教导。

他的书桌右壁上，有一副他亲笔写的对联：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

他珍重地对我说：“这是我的自勉词。‘知足’就是有的事情应当永远‘知足’，比如物质上的衣、食、住、行等等，都不要苛求享受，而在操行、掌识等等的追求上，要永远‘知不足’。‘有为’呢，就是有些事情要永远努力去做，比如对人民、国家有益，能促进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事。反之，对人民、国家、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有害的事，都千万不能做。这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起码要求，你现在才十二岁，来日

方长，你要永远记住这十个字，努力去实践！”

这话说来，将近八十年了！这十个字我还是牢牢记住了，也努力去实践了。但是否都做到了？还不能由我自己来说。

致 铁 凝

铁凝：

你七月一日的信，我早就收到了，因忙未即复为歉。

陈钢给你照的相，美极了！铁凝，你要好好地珍惜你的青春，你的才华！你有机会和农民接触，太好了！我从小和山东的农民在一起，他们真朴实，真可爱！你能好好写他（她）们吗？我想你会的，我对你抱有无限的希望。

北京秋天已经来了，好容易！望你珍摄！

冰 心

九、五、一九九一

（此信曾发表于《河北日报》1992年10月6日。）

致 王 一 地

一地：

真是太勉强了，我的字不好又不大，勉强写去^①，
能用就用吧，勿上。

祝

好！

冰 心

一九九一、九、十一

^① 指为山东省莱阳市的明末清初大诗人宋琬纪念馆题字。

玻璃窗内外的喜悦

我的“堂屋”，南方人叫做“大厅”的，外面没有凉台，阳光直射，而且那扇大玻璃窗，大得几乎占了半片南墙，因此非常明亮。

三天以来，每晨七时，我吃早饭的时候，窗外一定有只黄豆大小的蜘蛛，挂在窗前上部，我看不见那纤细的蛛网，只看到那只不时蠕动着蜘蛛，它是昨夜在我窗外吃蚊蝇的，早晨还来不及走，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可爱。可是早晨一过它便不见了，大概太阳一出来，它又回到窗外墙角窝里去了吧。总之，从此每天早晨一见到它，我这半天就感到高兴。

在这个窗台上，我还摆上一大盆向阳花，若是阴天下雨，盆里就只见满盆的细叶，只要有一点阳光。这一满盆的桔黄和浅红的五瓣的小花，立刻一齐开放出来，争妍斗艳，也使我非常非常的喜悦！

我喜欢阳光！天气的阴晴总会影响我的情绪，阴天或下雨，我的心情就不开朗，无端地惆怅抑郁。可

是太阳花一开始开放，我就知道太阳一定出来，我这一天就欢畅了起来。

这时忽然想起：古人有句云：“有好友来如对月，得奇书读胜看花。”我曾在朋友留字的本子上题过它，也有朋友替我找出了这两句诗的出处，我到底还是忘了是哪位古人写的，现在细细品味起来，这两句诗并不怎么好！月光比较清冷，它引起的联想，多半是忧愁感喟。看月都是在夜里，这时人们多是情静孤独，如李白之“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种的诗，中国是太多了，不必多引。至于写太阳的诗呢，我所知道的，就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总之，月光是使人流泪的，阳光是使人流汗的，白天人们都忙于工作，劳动，没有心思做诗。

至于“有好友来”是否“如对月”呢？我就没有这种感觉！有好友来时，我们的谈话是热闹的，无忌的，暖烘烘的，像一片灿烂的阳光。“如对月”的，就是那一种应酬的，客客气气的，无事不来，言归正传”后，就“拜辞”的所谓“朋友”。

“得奇书读胜看花”这句也不现实，现在的“奇书”是太少太少了！而现在我的书桌上，窗台上都到处是花：太阳花、荷花、君子兰、月季……而且花像孩子，没有一种不可爱的，（香味又当别论）连那最

贱的、花瓣很厚又没有一点光泽的“死不了”，也不让人讨厌。与其望穿双眼去等那不可必得的奇书，不如随时随地观赏我所喜爱的花朵——有人来了，就此打住。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91年10月16日。）

再 写 萧 乾

我在李辉写的《浪迹人生——萧乾传》的序上，写过萧乾，写后觉得意犹未尽。他和巴金都是我最疼爱的老弟。文藻和我最欣赏巴金之处，是他的用情十分严肃而专一。萧乾却是一辈子结、结、离、离，折腾了多少次，但是我们却是怜悯（如果允许，我说“怜悯”）他，原谅他，而且了解他。

萧乾是个遗腹子，一生辛苦的母亲又在他七岁时弃他而逝。他从小就没有像我们似地，享过天伦之乐，他从小就渴望着“爱”，他心灵深处有流不尽的涌泉般热烈的“爱”，到处寻求发泄，所以在少年时期就有早恋的事，他都告诉我了。

他从会写字起，就用文字来倾泻他对一切的爱，他热爱他出生地的北京，北京的音、色、香、味，北京的一切都从他笔下跳跃了出来，一只小小的北京的昆虫，也能引起他写出几万字的文章！

他一生孤独，一生辛苦，一生漂泊，步入老年的

他——我可爱的小弟弟，终于走上他一生最安定最快乐的生命道路。他定居在他热爱的北京，做上了他熟悉的文史工作，最称心如意的还是他终于有了一位多才多艺的终身伴侣。他们志同道合，心投意合，他那一颗炽热飘泊的心，终于有了一个最温馨、最妥适的安顿地方。他的写作精力更加旺盛了！怪不得在我每天收到的种种书刊上都有他的文章！昨天我收到一本《香港文学》，没想到那上面也有一篇他写巴金的长文。小老弟，你真是老当益壮！你把精力匀给我一点好不好？我从“五四”后写到现在，只落得勉强写一篇篇的“千字文”！

1991年9月13日浓阴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91年10月19日。）

我的家在哪里？

梦，最能“暴露”和“揭发”一个人灵魂深处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向往”和“眷恋”。梦，就会告诉你，你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地方和人。

昨天夜里，我忽然梦见自己在大街旁边喊“洋车”。有一辆洋车跑过来了，车夫是一个膀大腰圆，脸面很黑的中年人，他放下车把，问我：“你要上哪儿呀”？我感觉到他称“你”而不称“您”，我一定还很小，我说：“我要回家，回中剪子巷。”他就把我举上车去，拉起就走。走穿许多黄土铺地的大街小巷，街上许多行人，男女老幼，都是“慢条斯理”地互相作揖、请安、问好，一站就站老半天。

这辆洋车没有跑，车夫只是慢腾腾地走呵走呵，似乎走遍了北京城，我看他褂子背后都让汗水湿透了，也还没有走到中剪子巷！

这时我忽然醒了，睁开眼，看到墙上挂着的文藻的相片，我迷惑地问我自己：“这是谁呀？剪子巷里

没有他！”连文藻都不认识了，更不用说睡在我对床的陈珪大姐和以后进到屋里来的女儿和外孙了！

只有住着我的父母和弟弟们的中剪子巷才是我灵魂深处永久的家。连北京的前圆恩寺，在梦中我也没有去找过，更不用说美国的娜安辟迦楼，北京的燕南园，云南的默庐，四川的潜庐，日本东京麻布区，以及伦敦、巴黎、柏林、开罗、莫斯科一切我住过的地方，偶然也会在我梦中出现，但都不是我的“家”！

这时，我在枕上不禁回溯起这九十年所走过的甜、酸、苦、辣的生命道路，真是“万千恩怨集今朝”，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前天下午我才对一位年轻朋友戏说，“我这人真是‘一无所有’！从我身上是无‘权’可‘夺’，无‘官’可‘罢’，无‘级’可‘降’，无‘款’可‘罚’，地道的无顾无虑，无牵无挂，抽身便走的人，万万没有想到我还有一个我自己不知道的，牵不断，割不断的朝思暮想的‘家’！”

（本发表于《中国文化》1992年第6期。）

为“陆游杯”全国诗歌赛题词

陆游是我最敬佩的爱国诗人，他的诗篇里充满了爱国热情，读之使人感激奋发，如《夜泊水村》中之：“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白人无再青……”等等。《流火诗报》办“陆游杯”是一件大好事，希望竞赛者也能写出像陆游那样，使当代中国人民感激奋发的爱国诗歌！

冰 心

一九九一、十一、五

（题词刊于《流火》1992年3月10日。）

致 林 正 让

正让先生：

示悉，您如已同上海文艺出版社说好可以印行我的全集，当然可以。请同卓如联系。

冰季的两本书：《温柔》、《幻醉及其他》，记得一本是我作的序，一本是沈从文作的序，你们如也选刊，很好。但这两本书我处没有，据卓如说图书馆可以借到，还是请她编吧。匆上，祝好！

冰 心

十一、十一、一九九一

“孝”字怎么写

记得我母亲逝世的时候，我们家得到的许多奠仪中，有不少捆的金银纸箔。我们家供祖从来都不烧纸，因此那些纸箔都捆着放在一边。有一天一位长辈来了，看见母亲灵前只烧着一炉檀香，灵桌前连一个火盆也没有，金银纸箔也没有被叠起焚化，他心里大不以为然，出去就对人说道：“人家都说谢家孩子孝顺，我看他们连‘孝’字都不知道怎么写！”听到这句话的另一位长辈又把这话传给我们，我们只有相对苦笑。

真的，在我们家里，很少听见“孝顺”这两个字。当我们 1911 年从烟台回到福州大家庭时，父母亲只嘱咐我们说：“回去在大家庭里不能那么‘野’了，对祖父尤其要尊敬。”

回去在大家庭里，祖父也从来没有教训我们要

“孝顺”。倒是我的三个小弟弟彼此嘲笑时，例如父母亲吩咐做一件事情，有一个抢先做了，得了夸奖，其余的两个就站在远处，笑着说：“孝子，真孝顺，廿四孝加上你，廿五孝了！”于是又引起一番吵架。

大概那时我们都看过《二十四孝》那本书，其中有“王祥卧冰”、“孟春哭竹”等极不科学的愚孝的表现。尤其是“郭巨埋儿”，我认为那是最不人道而且是最不孝的一件事，因为儿子分吃了父母的食粮，就把儿子活埋了，那是什么心理？！要丢掉儿子，就是把儿子卖了也不至于伤父母的心。他的所以要“埋儿”，只为的是掘地得到金银为伏笔！尽孝为的是得到金银，这“居心”还“可问”吗？

我想《论语》里谈到“孝”时最多，孔子是因施教的，对“孝”字有不同的解释。但也有使人不解的地方，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我认为那也看那“父”是什么样的人，假如那“父”是岳飞，不必说“三年无改”，就是“终身”也不能改；假如那“父”是秦桧，那是一分一秒也不能学的！

我又去翻了《孝经》，看到了《谏诤章》，我心里廓然开朗，特此恭录如下：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

言与，是何言与（重复一句，极言其不可也，冰心注）。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抄完这一段，我真是“心悦诚服”了。此孔子之所以为“至圣先师”也！

1991 年 11 月 16 日之晨

（本篇发表于《随笔》1992 年第 2 期。）

关 于 男 人（之十二）

十四 我们全家人的好朋友——沙汀

我和沙汀认识是在五十年代初期。一位年轻同志把我带到东总布胡同作家协会东院一座小楼里，张天翼住在楼下，沙汀住在楼上，我们同时见了面，从此就常常在一起开会谈话，渐渐地熟悉起来了。

关于沙汀的人格之高尚，文格之雄浑，大家都有定论，不用我说了，我只谈谈他和我家每一个人的交情。

我的老伴吴文藻，是学社会人类学的，我们两个人隔行如隔山，各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朋友，我们看见对方的朋友来了，除了寒暄之外，很少能参加谈话。唯有沙汀是文藻最受欢迎的人，而且每次必留他吃饭，因为沙汀能和他一起喝茅台酒，一面谈得十分欢畅！

文藻喜欢喝酒，这是自幼跟他父亲养成的习惯，我却不喜欢他喝酒，认为对他身体不好。他的朋友和学生总是送他茅台酒，说是这酒强烈而不“上头”，就是吃了不头晕，于是我们厨柜里常有茅台酒。八五年

文藻逝世了，沙汀来看我时，我把柜里的一瓶茅台酒送他。他摇摇头说：“如今我也不喝酒了！”

四十年代我们在四川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住过五年。我的孩子们都是在四川上的小学，学的是一口四川话（至今她们在背“九九表”的时候，还用的是四川话），非常欢迎能说四川话的客人。沙汀说的是一口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因此他一来了，她们就迎上来，用四川话叫“沙伯伯，沙伯伯！”而且总要参加我们的谈话，留恋着不肯走开。

沙汀听觉一向不太好，因此我们从来不打电话，他来了听话时，也常由同来的小伙子在他耳边大声地说。如今听说他视觉也不行了，又误用了庸医的药，以致双目失明，要回到老家四川绵阳去了。我的外孙陈钢去给他照相时，我让他带上一个橡皮圆圈送给沙汀爷爷。我认为凡是有一两处感官不灵的人，其他的感官必定格外灵敏。我想沙汀回到温暖舒适的故乡气氛里，又有温柔体贴的女儿和他作伴，在他闲居时候，捏着这个橡皮圈，一边练手劲，一边也会想起远在北京、永远惦念他的一个老友吧！

1991 年 11 月 19 日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1992 年第 1 期。）

在介绍中国出版的黎巴嫩的 作品的会上的书面发言

我非常高兴在 1926 年得到了一本纪伯伦自己用英文写的《先知》。我为他的“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所感动，而把它翻译过来的。我最喜爱的警句是：

爱除自身外无施与，除自身外无接受。
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
因为爱在爱中满足。

1991 年 11 月 22 日

我看小说的时候

我的书桌上总有几本新来的文艺刊物，而且多半是小说。我不能让那些刊物总堆在那里，在清理之前，我总要草草地看它一遍。

我看小说，总是先看熟人写的，这些作者我不一定都认识，但熟悉她（他）们的性格和文风。

我看小说，总是先看女作家写的。因为女作家小说里的女人，总是真实的跃然纸上！过去的就不多提了。如“收获”，今年第一期里女作家陆星儿写的《小凤子》，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我看小说，总是先看短的，以后再看长的。我的时间很零碎，往往有客人来打断我的读兴。

我看小说，爱看那些没有结局的，使我多一些探索，多一些回味。

我不爱看那些风、花、雪、月，写景多于叙事的作品。看时觉得很热闹，过后却一点印象也没有！

我不爱看中国人写小说写得像译文那样地冗

长、别扭。

我不爱看的東西太多了，我觉得寂寞！

介绍一篇好小说 ——刘平的《代笔》

《小说月报》是我最爱看的文艺刊物。这一期（91 年 11 期）女作家的小说还特别地多，如张洁、铁凝的……读了我发出如晤故人的微笑。谁知道看到最后一篇刘平的“代笔”，使我心魂悸动！好容易平静的心潮，又汹涌起来了！

《书讯报》有信给我，让我在它的第四版“作家与作品”上写文章，还说是将于杨花似雪的阳春三月出“春播专栏”，还要“名人写名人”。这般地郑重！

我不是名人！这位刘平同志，我以前没有看过他的文章，也没听说过他的文名，在一般读者的眼里，可能算不了一个名人吧。但我不能不介绍他这篇小说，写得太精彩了！

《代笔》这篇文章不长，只写一位教了三十多年书的老教师，还是“一贫如洗”，写文章也拿不到多少钱，只好每星期天出到街口，为人代写书信。

现在是有文化的人少，有钱的人多，他惊奇地发现这“代笔”的钱，来得很容易。

有一天，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稚气而又“世故”的小伙子，来请他写信给一位朋友，信要这样写：

别念那臭师范了！出来当个教书匠，能挣几个子儿？我这儿正急用人，你快来，除了吃住，我每月还能给你四百块钱！

老教师一算，四百块加上吃住，等于他半年工资了，他看着那小伙子的脸，心里一激灵，问：“那受信人叫什么名字？在哪里读书？”原来那受信人正是他自己在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就学的儿子张小刚！

老教师气得拧上了笔帽，不写了！

那小伙子说，“怕我不给钱吗？”一面把崭新的十元大票扔在桌上。

老先生像一只发怒的狮子，吼着说：“不写，给多少钱也不写！”他吼的多么痛快？金钱是什么东西？

关于今日中国“有钱而没有文化的人太多了”的问题，我谈过多少次了。“万般皆上品”（1987年7月），“我请求”（1987年10月），“开卷有益”（1989年10月），等等，而这些文章和那些政治报告上的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样，都没有起过什么作用！

这一次我要把《代笔》里的老教师的狮子吼，送到《书讯报》的“春播时节”专栏里，希望它能随着杨花似雪的春风吹到关心国家前途的中国人民心里，大家冷静地听听吧！

1991 年 12 月 15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书讯报》1992 年 3 月 30 日。）

“大雪”这天下了大雪

我永远喜欢下雪的天！

大约三四岁吧，我记得我的奶娘把我抱到窗台上，望外看下雪的天，说：“莹官呀，你看这雪多大！俗话说‘大雪纷纷下，柴米油盐都落价。’”那时我还不懂“柴米油盐”对一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落价”了又有什么好处？只觉得下了大雪，天上地下都锃亮锃亮地晃眼。

我们出去又听见路旁金钩寨的农民们，都喜笑颜开地说：“‘大雪兆丰年’，明年不怕吃不饱了！”原来大雪和吃饱饭还有这么大的关系！

从我会认字起，母亲就教给我说：一年四季，就有二十四个“节气”，如：立春、立冬、雨水、芒种等等，但是“雨水”那天就不一定下雨，因此我也常去注意它。

今年十二月七日早起，只看见窗外一切都白了！四围的楼瓦上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雪，地上和人们

停放在门口的许多辆自行车上，也蒙上厚厚的一层雪被。而我周围的空间里还是下着千千万万朵柳花似的漫天匝地的大雪！我又想起几句古诗，一是一位“寒士”抒发他的郁抑心情之作：

填平世上崎岖路
冷到人间富贵家

还有一首忘了是哪位名诗人写的：

雪后溪山照眼明
出门一笑大江横
龙蟠虎踞三分地
留与先生拄杖行

看这位老诗人的心境是多么喜悦，多么超逸、多么豪迈！

而我在“照眼明”的光景里，眼前既没有“溪山”，门前也没有“横”着一条大江，我的住处也不是“龙蟠虎踞三分地”，而且我除了用“助步器”之外，连“拄杖”也不能行走的！

但是我低头看了书桌上的日历的“今日大雪”字样，还是高兴地想：“我们五千年古国讲的‘节气’，

还是真灵!”

1991 年 12 月 20 日晨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散文》1992 年第 3 期。)